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的一些意见、观点及主张系统化的概括和总结,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外交方针的确立及外交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也是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外交思想中国家利益问题是学术界争议比多的一个问题。学术界普遍从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主要观点有:一是认为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相互作用的;二是认为毛泽东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三是认为毛泽东把意识形态利益等同国家利益;四是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是主要以意识形态为价值取向的。[1]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所致。因此,笔者将简要从论述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探讨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及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是一种主权利益观,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始终是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重的。

一

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美国现实主义的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话语就只能是国家利益”。[2]但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笔者倾向于将国家利益界定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这些要素包括以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主权的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它要求一个国家对内拥有发展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权,对外与其它国家能够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政治利益表现为国家维护各自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力争在世界上扩大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可见,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紧密相关的看法、见解和观念体系。“它是一个观念体系,但不是一般性的,而是系统化了的观念体系,是指向某种目标和理想的、把一种特定的社会立场合理化或正当化的思想观念体系”。[3]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和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不过,意识形态利益在国家利益分层中属于一般国家利益,而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当一般国家利益与根本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任何国家都会暂时牺牲一般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因为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实在,因而,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一个国家要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怎样生存和发展才最符合国家利益,却是要



通过人的认识和判断来加以主观认定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受国际环境、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判断者的主观认识水平的制约。由于主观认识水平的不同，主观判断的国家利益与客观国家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主观认识水平是指认知能力、特定意识形态中的信仰、价值观决定的认知取向。任何国家(包括其领导人)对外部事务的认识必然与该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所影响。因此，在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过程中，各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溶入到国家利益里，甚至用它们来解释国家利益。因而，由于信仰、价值观的不同，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讨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利益观、理想主义利益观、建构主义的利益观等，笔者认同国内一些学者从“权利”的角度，以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原则为依据，把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分为强权利益观、主权利益观的观点。主权利益观是主张在主权范围内界定国家利益，而强权利益观者主张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权力是行为者迫使他人做他们不愿做的事的一种能力。权力的这种性质规定了行使权力的行为者所获得的利益，是剥夺他人利益的结果，是以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为前提的。毛泽东一生所坚持的是主权利益观。

毛泽东没有专门用过“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更没专门的理论去论述它，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最高决策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战略家，毛泽东非常重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主要体现在他长期的决策实践及一些重要的会议讲话、与外国领导人及来宾的谈话以及与政府各级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关于国家利益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国家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国家安全不保则其它利益一概不保。毛泽东深知这一道理，把国家的安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毛泽东重视发展国家自卫能力。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4]为增强国防力量，毛泽东顶着美苏两个核大国的压力，在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独立发展核力量和航空航天技术，确保国家安全。为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尊严，毛泽东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华的侵略和强权行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第二，国家政治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的政治安全利益。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安全，尤其是新生的中国共产政权的安全是最大的安全，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保卫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权体系的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的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危险性，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作用。尽管使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大国地位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但他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在建交问题，他坚持要在对方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后再通过谈判重新建交，同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



他亲自草拟致联合国声明，要求联合国将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驱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毛泽东积极主张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不结盟运动，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第三世界中一个大国的作用。

第三，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新中国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物质保障。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的经济利益，早日把新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愿望。为此，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一完成，他就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在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即国民经济建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的道路，并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毛泽东提出对外开放的论断，主张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外资来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张首先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也积极寻找途径开展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期间，心里还牵挂着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他于22日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5]为了打开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通道，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做外国客人的工作。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同年10月，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强调了同样的原则。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它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主张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应该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不允许利用经济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企图利用经济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损害中国的利益。如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两国间签订的经济技术合同及协定；1961年，苏联乘中国发生自然灾害之际强行逼债，毛泽东一方面同苏联这种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号召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苏联毁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困难，维护了民族尊严。

第四，国家文化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他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重视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为了消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他积极倡导在人民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强调：“为了作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了群众所掌握。”[6]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极其屈辱的历史，毛泽东常以此来教育国人，以提醒人们任何时候都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毛泽东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来振奋民族精神。针对建国前后一些人心存对美国的恐惧感，毛泽东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伸不起腰”，我们“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7]。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总体上反映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迫切需要维护和实现自身主权利益的客观现实,因而是一种主权利益观。主权是一国固有的处理其国内、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包括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无不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论、帝国主义论及国际主义原则对毛泽东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利益也成为他的国家利益观的一部分,正如上文所说毛泽东把它看成是重要的一部分,把新中国的政治安全看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最根本的利益。然而,毛泽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决策人,总体来说,他一贯坚持的是以国家主权利益为重,意识形态利益从属、并服务于主权利益。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有突出的体现。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帝、反霸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的出发点是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独立权、平等权,争取实现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使中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 独立自主思想。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一个基本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得来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外交,使中华民族饱尝了丧权辱国之苦。历史已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没有一切。所以,毛泽东非常珍惜中华民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为了实现新中国真正的独立,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8]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实现主权的真正独立,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按照本国的意志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不受任何外力的控制和干涉。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方针,使新中国得以彻底摆脱旧的、屈辱的外交,为实现新中国主权独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的坚决斗争,显示了毛泽东反对大国控制和干涉,维护中国主权独立的坚强意志。建国之初,毛泽东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尽管制定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外交战略,但在处理对苏关系时,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部队。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上述两项建议显示出苏联有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因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派遣武装力量进入台湾海峡,并把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境,对新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威胁。毛泽东果断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原则立场。朝鲜停战后,美国以台湾“中立”、“托管”名义来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制造“一中一台”,分裂中国主权。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针锋相对的举措与美国的强权的行为及阴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炮击金门、马祖显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和



坚强意志；在中美大使级谈判期间，中国对美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进行了据理力争。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再无法无视新中国的客观存在，于是便有了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开启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大门。正是在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二、和平共处思想。和平共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政策与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在确立中国开展对外关系原则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给即将开始的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就多次指出，新中国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和平共处思想在新中国外交中得以贯彻和执行，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突出地表现为两大阵营由严重对峙逐步演变为冷战共处，使不同制度的国家间有了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可能。在国内，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基本肃清，中国进入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八大提出工作中心转移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经济文化建设迫切需要更多的朋友，需要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53 年 12 月，周恩来在中国和印度就西藏地方问题举行谈判时，把毛泽东的和平共处思想概括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次年先后同印度和缅甸两国正式倡导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泽东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0]他认为，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也需要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不仅中国需要，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亚非拉国家需要，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在中国的推动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关系普遍公认的准则。

毛泽东和平共处思想的核心：一是强调国家的主权独立，倡导各国间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11]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任何国家不就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别国身上。二是强调国家平等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平等相待。1954 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外宾谈话时强调：“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12]三是强调发展权，和平相处，互不侵



犯，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冷战强权政治盛行的年代里，毛泽东这种以维护主权利益为核心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命运，尊重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权利。

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毛泽东把握国际关系趋向的核心内容。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造成二战后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也是对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只有坚持不懈地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斗争，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毛泽东在反帝、反霸的斗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反霸理论。第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提出的，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虽貌似强大，但由于它代表反动的势力，所以它们总要失败的，是“纸老虎”，中国革命的胜利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用这一思想，鼓励新兴的独立国家要敢于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和崇拜，“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对待它们。”[13]第二，反帝、反霸不怕鬼、不信邪。毛泽东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对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和安全的任何侵犯与威胁，都敢于斗争，坚决予以还击。毛泽东把敢于斗争比是不怕鬼，他认为：“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14]当美国对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抗美援法的斗争。同样，当苏联不顾中国的警告，不断挑起边境冲突时，毛泽东顶住了苏联的核讹诈，坚决进行了自卫还击。第三，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把这一传统运用到反帝、反霸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世界长期为美苏占主导地位的两极格局所主宰、支配，先是美国，继而苏联对中国及世界其它地方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为，给中国的安全乃至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毛泽东依据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如从“一边倒”到“两条线”，再到“一条线，一大片”，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集团，无论其性质如何，只要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都加以团结、加以利用。第四，中国永不称霸。毛泽东在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同时，强调中国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他告诫全国和全党：“对外国，永远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能干涉别国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15]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毛泽东和中国政府进一步向世界表明：“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6]

毛泽东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实质首先是维护中国的生存利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在中国周边或针对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强权政治，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构成威胁，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是捍卫中



国的生存权力。其次是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因而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求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只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中国才能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再次是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霸权主义是旧的国际秩序的产物，在这种秩序中，国际上的事务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任意干涉别国的内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这样，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国权常常受到干涉和侵害。毛泽东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平等协商、平等参与的国际新秩序观，表达了亚非拉国家的共同愿望，因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也得到空前提高。

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贯穿始终的正是国家利益。当然，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同样也受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因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时候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有与中国客观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毛泽东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意识形态成份较浓，如对国际共运中“修正主义”威胁的认识就不太客观，认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一样，都对我国构成威胁，在战略上同时既反帝、又反修，一度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总起来说，毛泽东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客观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实践中，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也不断调整他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以便更好地反映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也证明：正是毛泽东以维护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为最高原则，从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使我国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重要的国际力量。

---

[1]参见以下文：李义才：《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第29—35页；杨成、刘伟、胡庆忠：《毛泽东国际关系价值取向初探》，《理论月刊》2003年第3期，第33—34页；阎学通：《国家利益的判断》，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37页；石红霞：《从意识形态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11期，第30页；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171页。

[2]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54页。

[3]任晓：《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5页。

[4]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版，第 40 页。

[6]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3 页。

[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87 页。

[8]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5 页。

[9]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6 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5 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1 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1 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9—340 页。

[14]毛泽东：《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1 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5 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 年 4 月 11 日，第 1 版。

